

在辽宁省农村工作会议上

大寨和昔阳同志的讲话

(摘 要)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在辽宁省农村工作会议上
大寨和昔阳同志的讲话

(摘 要)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四年·沈阳

在辽宁省农村工作会议上
大寨和昔阳同志的讲话
(摘要)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印张: 3 $\frac{1}{2}$
字数: 53,000 印数: 1—500,000
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: 3090·236 定价: 0.20元

(内部发行)

目 录

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1
昔阳县洪水公社党委书记张斌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28
昔阳县南埕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43
昔阳县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58
昔阳县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堂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75
昔阳县南埕大队党支部委员、 副大队长赵志武同志的讲话·····	99

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郭风莲同志的讲话

正当我国人民认真学习十大文件，贯彻落实十大精神，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时候，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，我们昔阳县社、队的同志和陈永贵同志一起来到辽宁省，参观了三天，从我自己来讲，是开阔了眼界，增加了知识，学到了很多经验，特别是先后到台安县达牛公社和营口市水源公社，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路线教育课。看看水源公社的变化，看看刘盛田同志带领水源贫下中农所走过的道路，再想一想我们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大寨的党支部，在陈永贵同志带领下所走过的道路，使我们感到每当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，要使它成长，不经过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不可能的。新生事物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。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，要改变面貌，不经过斗争是根本不行的。我从小长在

大寨，今年二十多岁。大寨的变化二十多年了，我的成长也是二十多年了。今天在同志们面前，把大寨的情况介绍一下，也把我锻炼成长的体会谈一谈。

大寨大队从一九四五年解放，一九四六年组织互助组，一九五三年走上了合作化道路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树立了这面红旗。大寨道路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了。二十个年头，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，使大寨变了样，大寨的巨变，是大寨贫下中农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自然灾害斗，与错误路线斗，七斗八斗斗出来的。从大寨大队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，要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才能成长发展起来。我是一九六一年高小毕业后到大队的，当时，正是我们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，刘少奇在农村大肆推行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的修正主义路线。那时，大寨大队在昔阳县是个先进队，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学习这个先进队。他们搞的是重副轻农、重钱轻粮，大搞小块地、黑市场、自由买卖，资本主义泛滥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大寨大队是怎么样呢？大寨大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。大寨大队连一块、一亩头的“自由地”也没有搞过。在

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寨大队是三年大丰收。在那种形势下，大寨大队的社员不是为了自己富裕，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想的是全国，是世界革命。大寨连年丰收，粮食很多了，但是，我们没有到市场上卖一粒高价粮。赵壁大队到大寨要高价买谷草，陈永贵同志问：你们买谷草是不是出去高价卖呀？他当时没有回答上来。陈永贵同志说，我们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与资本主义是不搞任何关系的。你要想高价买我们的谷草出去搞资本主义，我们是不允许的。最后这个同志说，他不是搞资本主义，是买草喂队里牲口的，要出三角钱买一斤谷草。陈永贵、党支部、贫下中农不同意卖高价，认为一斤粮食不到一角钱，一斤谷草卖三角钱，卖几万斤谷草，那不是发“困难财”吗？不能这样。我们要按平价卖，国家作价是多少，我们卖多少，最好的谷草一斤五分钱，一般的谷草一斤三分钱，支援他们几万斤。那时候，我们有粮食，兄弟队缺粮食，要高价买我们的粮食，我们没有高价卖过一斤粮。当时卖给兄弟队几万斤谷草，是伸出了友谊的手，使他们认识到：大寨大队坚持的是什么道路，使他们对刘少奇搞的资本主义道路有刻骨的仇恨，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热爱，看到了光明，

提高了勇气。这是我踏上农村第一步看到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。

一九六一年开始我们搞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。在这之前，大寨大队也搞过烦琐哲学的劳动管理制度。干部起早贪黑，和社员一起干活，早晨天不明就起来给社员包工。每天东坡上去，西坡下来，从来没落下个好。群众说，这也包的不合理，那也定的不合理。工分要是多了，他感到干部还好；工分要少了，那就是干部没给他好处。干部受气，群众受罪。我们大队人口少，劳动力比较缺乏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。强壮的男劳力把工分都挣了，妇女没活干。妇女谁不愿意参加劳动呢？毛主席说：“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，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。”可是，在刘少奇大搞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，再加上搞“三包一奖四固定”，就把劳力都固定住了。每天包工，“好劳动力干，弱劳动力看，老汉妇女靠边站”，这就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。那时，工分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总是转圈圈的，早上起来看工分，到地里也是想工分，这就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了邪路。一九六一年在陈永贵同志带领下，大寨党支部和大寨的贫下中农把烦琐哲学的劳动管理制度给砸

烂了，实行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，不要工分挂帅，要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。没有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，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不可能的。在改革劳动管理上，我们大队的转业军人起了很大作用。我们评工分的时候转业军人说，我们解放军在前线打起仗来，什么地方需要他去，他就去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去。如果到了战场，跟敌人拚死拚活地斗争，还能返回来问问首长给我多少工分吗？不能这样做。我们是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了，如果在工分上斤斤计较，为自己谋取利益，那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大寨大队实行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，就是标兵工分，自报公议，民主评议。以前是天天评工分，后来变成了一年评一次，评工分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把标准工分定出来，我们社员自觉地按着标准工分来看自己。记工员的工作也不那么复杂了，每天在记工表上只记社员的出勤，到年终的时候自报工分，民主评议，总结一下，就把社员一年的报酬结算完了。节省下这么多评工分的时间干什么？大寨党支部的同志，平日是白天劳动，晚上开会，和群众在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，加强思想路线教育，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，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这块阵地。

大寨大队从一九五三年实现合作化后，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，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。这个十年规划，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实现了。一九六二年粮食亩产上升到七百多斤。一九六三年在连年丰收的情况下，贫下中农提出亩产要突破“长江”过八百斤大关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八月份我们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，从八月二日到八日，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大雨，降雨量达六百五十多毫米。山上的洪水从七条大沟流下来，直扑大寨。就是我们老一辈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的袭击。七天七夜的大雨，把大寨搞成了山流、地冲、房倒、窑塌、庄稼倒伏，八十户社员七十八户塌房。这一场毁灭性的洪灾，对大寨的贫下中农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和很大的锻炼。特别是对我们青年来说，是很好的一次教育，很大的考验。遭了那样大的洪灾，大寨的社员是怎样想的？有的社员感到灾情很重，损失很大，国家要不给一点救济，恢复这场灾害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的。阶级敌人说什么，“大寨遭这么大灾，只有一条路：外出逃荒。”在这关键时刻，陈永贵同志和大寨的党支部不是这样想的。雨过天晴以后，陈永贵同志七天七夜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他想：面貌

变不变，关键在路线，正确的路线靠谁来执行？主要靠我们的领导班子。群雁高飞靠头雁。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我们党支部。党支部迈什么步，群众就走什么路。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，是躺在国家身上，还是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自力更生，战胜灾害？陈永贵同志提出，想战胜自然灾害，只有自力更生一条路。当时，陈永贵同志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，首先统一党内的意见。党员们说：要国家救济还显示什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呢？自力更生是毛主席制定的方针，我们贫下中农不执行，谁来执行呢？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统一了。然后我们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一起回想了解放走过的道路：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多年，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。一九五三年办社的第一年，因为我们大寨很穷，就向国家借了七千块钱，买了十八头耕牛，秋后丰收了，还清了国家的七千元钱。从这以后，一直到一九六三年，再没有向国家借过一分钱，就靠一颗红心两只手，自力更生样样有，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害，使大寨发生了变化。我们的道路是自力更生的道路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。陈永贵同志在“自力更生十大好处”里提到一条：“坚持自力更生，有利于教育青年。”

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不可能不遇到困难，如果现在我们伸手向国家要，给青年留下不好的影响，将来一遇到灾害就向国家伸手，就不能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了。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坚持自力更生最有好处，并制订了一个规划，五年恢复大寨的土地，七年恢复大寨的房屋。当时，国家也给我们大寨送来了救济。有钱，有物资，还有医药费，有寒衣，有药品……什么都有。三次给我们救济，我们都没有要，都给国家退回去了。贫下中农说，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遭了灾伸手向国家要救济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？要把这些钱送给其他遭灾社队。阶级敌人是怎么样呢？他们说，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寻也寻不见，找也找不到，送上门来还不要，傻瓜子的干部，傻瓜子的群众”。毛主席说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”，“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”。阶级敌人这样猖狂地反对，证明我们坚持对了。如果他们称赞我们灵，那我们就是大傻瓜。现在，大寨变了。这个新大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经过大寨贫下中农出大力，流大汗，用汗水换来的。这靠什么？就靠毛主席革命路线。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要粮有粮，要钱有钱，住房

是楼上楼下。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国家给的再多，也是不行的。我们体会到，国家给的粮可以吃光，国家给钱可以花光，但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用不了、用不完的财富。只要发动群众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就能够想出更多的办法，增加更多的智慧，来发挥更大的力量，战胜一切困难。从我自己思想来说，当时我才十六岁。看庄稼冲倒了，土地流失了，房屋冲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年青人的思想是比较动摇的。后来，在恢复这场灾害的斗争中，才真正教育了我和广大的青年。自然条件是靠人来改造的，灾害是靠人来战胜的。毛主席说：“社会的财富是工人、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。”由于大寨党支部在陈永贵的带动下，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使那一次灾害很快得到恢复。原来计划五年恢复土地，七年恢复房屋。实际上没有用了七年，也没用了五年。大寨的土地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恢复了。大寨的住房也很快建设起来了。那时候，大寨从老到小，从干部到群众，起早贪黑。不论是炎热的夏天，还是数九寒冷的冬天，冰雪盖地，每天天不明起床，晚上看不见才收工。我们恢复大寨的新农村，不是白天搞的，大部分都是在晚上搞起来的。我们靠

什么？靠毛主席革命路线。在我们扶庄稼的时候，我们说这苗不好扶。陈永贵说，人倒不了，庄稼就能站起来。这样，我们把冲倒了的庄稼一棵一棵地扶起来；把冲毁了的土地，一块块地修起来。大寨的贫下中农，干社会主义是出了大力，流了大汗的。在战胜自然灾害中，大寨大队党支部，对青年这支突击力量是很重视的，对妇女这“半边天”也是重视的。遭了灾，我们青年分成两个突击队：一个是男青年，一个是女青年。当时，这两个突击队展开了竞赛。一九六三年冬天特别冷，就是这样冷的天，她们和男的一样干。大寨“铁姑娘”队是在一九六三年冬天大战狼窝掌的时候成立起来的。有一天零下二十二度，狼窝掌到大寨有四华里，把饭担到地里都冻成冰渣饭了。我们在山上吃饭的时候，拣些柴禾，给老一辈烧一烧火，烤烤饭菜再吃。陈永贵同志说：不用烧柴禾了！要是在旧社会，有这么一锅冰渣饭就不用讨吃要饭了。陈永贵同志讲了他的家史、大寨的村史。我们边吃冰渣饭，边听老一辈回忆旧社会的苦。虽然饭是凉的，心却是热的，冰渣饭也不觉得凉了。那天下午，快落太阳时，陈永贵同志说：姑娘们，你们早些回去吧，暖和天多干一会就有了。可是大伙说，不回去，老一辈都能坚持，咱还不能坚

持，只有坚持才能得到胜利。收工的时候，老年人说，现在的青年，特别是这些姑娘，可和过去的姑娘不一样了。我们怎么干，她们就怎么干，象铁人一样。从那天起，就把女青年突击队改成了大寨的“铁姑娘”队。我们要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，创前人没有创出的奇迹。男青年也同样干，重活都在他们肩上。大寨石坝的石头，是谁从山上挑下来的？是大寨的青年民兵挑下来的，一块一块挑下来，垒成一道一道的石坝。这石坝是反修的铜墙铁壁。群众叫男青年是铁肩膀，叫女青年是“铁姑娘”。这铁肩膀、“铁姑娘”是我们老一辈带出来的。陈永贵同志当官不象官。有些人想象陈永贵现在身上穿的是呢子衣裳，手上戴的是进口手表，一定不是农民的样子了。其实，你看一看，他哪一点不和农民一样？他的衣食住行不是脱离群众的，他向来依靠群众，相信群众，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我们老一辈在抗灾斗争中起早贪黑，开山凿石，块块石头都有他们的手印，每块土地上有他们的汗水。我们以前不敢想象，把那七百多亩土地都恢复起来，而且成了稳产高产的大寨田。同时也恢复了大寨的住房，建了新农村。有些大队说，学习大寨就是学习大寨盖新房，建设新农

村。这就错了。我们是在改变生产条件的基础上，改变社员居住条件的。因为那时没有住房了，不修也没有住的，怎么办？就靠我们自己的双手，自力更生，建了二百零八孔窑洞，四百七十多间房。现在一口人平均一间半，居住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变。我们自力更生战胜了这场灾害，给了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，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，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。

我们来到辽宁省看看，开阔了眼界，看到了我们祖国广阔的大地。我们那里的群众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平原。大寨是山区，但是，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思想提高了，路线对头了，坏条件可以变成好条件。如果路线错了，好条件也利用不好。拿我们大寨来讲，没有平原造平原。陈永贵同志经常说，粮从地出，地靠人种，要想土地变样，首先人的思想要变样。人勤地不懒。大寨是有深刻体会的。一九五三年以前，大寨土地条件很差，最高的产量没上过一百斤，那时的土地是“土块打不烂，风吹遍地干。三天无雨苗发黄，一场大雨地冲光。地里上肥地边流，冲走肥土剩石头。”大寨七条大沟，过去都是干河沟，没有打过一粒粮食，没有种过一分田。合作化以后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在陈永贵的带领下，以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

的革命精神，在山上造起了层层梯田，山下造起了层层良田，过去的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。合作化时期粮食亩产达到二百多斤，公社化时上升到五百多斤。一九六四年跨过“长江”，一九七〇年跨过千斤关。过去没想的，今天办到了。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，靠大寨贫下中农的实干、苦干。这样的土地条件，机械化程度又很差，完全是靠人搬人挑，每年六千万担肥料全靠人从山上担回来。就这样用两个肩膀一条扁担，两个箩筐，一把镢头，开出了新大寨，搬走了旧大寨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我们是农民，不种田打粮食，还对国家有什么贡献？要想多打粮食，向国家做贡献，那就要改变生产条件。流汗要流到正经地方，出力要出在正经地方，没有一条正确路线是不行的。大寨正由于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才把坏条件变成好条件。

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，三年时间，我们掀起了三个高潮。第一次是就生产到顶的思想进行批修整风。我们一九六七年提出闯千斤关，直到一九六九年也没过千斤关。原因到底在那里呢？就是认为“人家治山有山，治河有河，治滩有滩，我们山也治了，沟也治了，滩也治了，没潜力了”，产量已经到九百多斤了，要和过去相比，翻了十几番了，不知不觉产生了生